

# 中國崛起與美中互動關係解析 (1990 ~ 2016) : 權力轉移理論與貿易和平理論的應用

林偉修\*

## 摘要

權力轉移理論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和貿易和平理論 (trade peace theory) 對於「中國崛起」提出截然不同的觀點。權力轉移理論認為，中國崛起改變了國際權力結構，當中國與現今霸權美國的權力差距愈來愈小，在中國亟欲挑戰美國霸權之際，雙方衝突升高的可能將是無可避免。然而，貿易和平理論卻認為基於機會成本的考量，美中之間盤根錯節的貿易關係使得兩國都不願意升高衝突，美中之間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本文整合上述兩個理論，提出貿易—權力轉移的分析架構並檢視 1990 ~ 2016 年間的美中互動。根據該分析架構，「中國崛起」拉近了美中之間的權力差距，提高兩國之間的緊張，但隨著雙方貿易從依賴關係一直發展到現在的美中互賴，中國選擇回應的方式受到限制，美中衝突或許會發生，但是衝突持續升高甚或變成武裝衝突的機率，可能並不如權力轉移理論所預期的。

**關鍵詞：**美中關係、貿易和平、衝突、權力轉移

---

這個版本經過數次修改，作者要感謝修改過程中劉致賢老師以及薛健吾老師給予的意見，也要特別感謝學報的匿名審查人以及編輯委員所給予的修改建議與方向。本文若有疏漏之處，皆為本人之責任。

\* 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助理教授，Email: 148660@mail.tku.edu.tw

收件日：2020 年 9 月 14 日；修正日：2020 年 12 月 6 日；接受日：2021 年 3 月 30 日

#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1990–2016): The Applying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rade Peace Theory**

Wei-Hsiu Lin\*

## **Abstract**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rade peace theory regard the rise of China differently.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rgues that while the power parit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becomes narrow, the probability of militarized conflicts will increase significantly. However, trade peace theory provides different insights, in which interlocking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that both countries are unwilling to solve conflicts with military power.

This paper integrates the two theories above and provides a framework with trade-power-transition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during 1990 and 2016. According to the framework, the rise of China did narrow power parity, intensifying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but the trade relation developing from dependence to interdependence relationship will constrain China's choices. Conflict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re still possible, however, the probability of militarized conflicts will not be as high as th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predicts.

**Keyword:** US-China Relation, Trade Peace, Conflict, Power Transition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lob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amkang University. E-mail: 148660@mail.tku.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2020.9.14; Revised: 2020.12.6; Accepted: 2021.3.30

## 壹、前言

「中國崛起」不僅引起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緊張，「中國崛起」背後兩國緊密的貿易關係亦是美國處理中國問題的棘手之處。從國際關係理論來看，「中國崛起」的現象同時涉及權力轉移理論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和貿易和平理論 (trade peace theory)，值得玩味的是，這兩個理論對於「中國崛起」提出截然不同的觀點。權力轉移理論認為，中國崛起改變了國際權力結構，當中國與美國的權力差距愈來愈小，在中國亟欲挑戰美國地位之際，雙方衝突升高的可能將是無可避免。然而，貿易和平理論卻認為基於機會成本的考量，美中之間盤根錯節的貿易關係使得兩國都不願意升高衝突，美中之間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微乎其微。準此，「中國崛起」與美中互動關係無論從實務或理論層面來看都值得進一步思考 (Weinhardt & ten Brink, 2020)。

事實上，無論是權力轉移理論或貿易和平理論對美中關係的詮釋都不完全。權力轉移理論忽略了經濟互動的影響；貿易和平理論則輕忽了貿易在不同國際權力結構下的意義。本文嘗試整合這兩個看似南轅北轍的理論，相互補強對方在推論上不足之處，提出貿易—權力轉移觀點的分析架構。本文將兩種不同的貿易關係（貿易互賴以及貿易依賴關係）和兩種不同的國際權力結構（權力差距大以及權力差距小）交互作用，建構出 $2 \times 2$ 的分析架構，並利用這個分析架構說明美國對「中國崛起」的回應，觀察美國和中國之間軍事衝突的可能性。

本文主要檢視1990~2016年間的美中互動，略過2018年後的美中貿易戰，因為美中貿易戰目前仍屬進行式，最終的發展未成定局，因此僅在結論簡略地從貿易—權力轉移的角度提出對美中貿易戰的觀察。本文主要的觀點是，1990年之後「中國崛起」雖然拉近了美中之間的權力差距，但隨著美中貿易關係從依賴關係一直發展到現在的美中互賴，中國選擇回應的方式受到限制，美中衝突或許會發生，但是衝突持續升高甚或變成武裝衝突的機率，可能並不如權力轉移理論所預期的。

本文分為幾個部分：首先簡述權力轉移理論和貿易和平理論，並說明這兩個理論如何分析「中國崛起」後的美中關係以及分析上的限制；第二部分則為本文之貿易—權力轉移的分析架構；第三部分則是以該架構分析美中關係，除了整體發展外特定著重幾個美中重大衝突事件，包括美國轟炸中國大使館事件、南海撞機事件以及歐巴馬 (Barack Obama) 政府時期的南海議題；最後則是結論。

## 貳、權力轉移理論、貿易和平理論與中國崛起

### 一、權力轉移理論與中國崛起

不少研究美中關係的學者都選擇以權力轉移理論作為分析美中關係的依據。權力轉移理論假定國際體系是一種階層體系，依權力相對配置關係分為主導國家 (dominant power)、強權國家 (great powers；後稱為挑戰國)、中等國家 (middle powers)，以及小型國家 (small powers)。主導國掌握最多資源，具主導地位，以結盟或滿足盟國需求的方式維持國際地位；次級國家遵守主導國所建構的國際規則並將之作為彼此互動的規範準則 (Tammen et al., 2000: 6-7)。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唯一能挑戰主導國國際地位的只有挑戰國。當主導國和挑戰國的權力差距甚大，後者無法挑戰前者，無法要求重新修訂現存國際規則時國際秩序最為穩定。當挑戰國憑藉快速經濟成長拉近與主導國的權力差距，衝突升高的機率將會大幅提高。不過，該理論指出最後是否會升高至軍事化衝突端視挑戰國對現存秩序的滿意度，當挑戰國認為現存秩序對其不利，有損其國際地位而應當重新制定國際秩序時，挑戰國與主導國的戰爭便在所難免 (Organski, 1968; Organski & Kugler, 1980)。

應用權力轉移理論討論美中關係的方式非常廣泛。陳亮智 (2009) 從權力差距強調美國在東亞區域戰略優勢的重要性，認為只要美國繼續維持與中國在軍事力量上的差距，美國利益就得以保障。Kim (2015) 從聯盟的角度觀察美中關係，認為南韓是美中關係中的關鍵平衡者 (pivotal middle power)，透過聯盟關係南韓可增強美國在亞洲區域的軍力，拉大美中之間的實力差距，降低衝突持續升高的可能。Lim (2015) 和 Tammen & Kugler (2006) 則從挑戰國對現狀的態度說明美中關係的發展。Lim 以中國軍事支出的增加度、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認同度以及中國對亞洲區域議題的態度等三個指標測量中國對現狀滿意度，並指出中國就是一個對現狀不滿的新興挑戰國，美中關係正處於衝突緊張的關係 (a collision track)。Tammen & Kugler 的觀點較保守，認為美中能否和平發展端視美國如何平和地將中國引入國際社會，中國若願意接受既有國際秩序，不做個挑戰既有秩序的挑戰者，美中關係依然有走向正面發展的可能。

儘管權力轉移理論受到廣泛運用，但該理論仍面臨挑戰。第一個挑戰關於權力轉移和戰爭之間的關係。Lebow & Valentino (2009) 否定了權力轉移理論對於戰爭的推論，認為權力轉移並非戰爭的原因，而是戰爭的結果。Mansfield (1994) 和吳玉山 (2011) 結合權力平衡與權力轉移，發現無論在權力均衡或不

均衡時，衝突升高的可能都因一方的低獲勝率而降低，衝突升高的時間點反倒落在權力分布均衡與不均衡的過渡時期。Geller (1992) 認為，權力轉移本身並無法準確地預期戰爭，而應將權力轉移時主導國和挑戰國成對的權力狀況做交叉分析。只有當成對國家的能力集中度 (capacity concentration) 都降低時，衝突升高至戰爭的機率才會增加。Kim & Morrow (1992) 發現權力轉移和衝突升高之間並無統計顯著關聯，行為者的風險是關鍵的中介變數。當權力發生轉移，主導國厭惡風險 (risk aversion) 而挑戰國為風險承擔者 (risk taking) 時，衝突升高的機率最高。第二個挑戰是衝突發起者的問題。Copeland (2000) 和 Chan (2004, 2008) 質疑挑戰國是衝突發起者的觀點，並提出主導國也可能是衝突發起者。Copeland 以動態差異理論 (dynamic differential theory) 說明，權力逐漸衰退的主導國在不確定挑戰國真正意圖以及確保自身優勢的情況下會主動拉高衝突態勢，發動預防性戰爭 (preventive war)。Chan 則指出，無論是挑戰國國力逐漸上升或主導國國力逐漸下降使得兩國權力差距接近，挑戰國的最適策略都應是延後升高衝突時點，因為時點愈往後延，挑戰國愈有時間累積實力，未來獲得勝利的機率愈大；相對的，主導國則應提前拉高衝突時點，憑藉目前尚存的權力優勢盡速取得衝突的勝利，並嘗試拉大和挑戰國的權力差距。

最後一個挑戰是國家權力的增長方式。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國家的內生成長因素，也就是技術、資本與勞力等生產要素決定了經濟成長 (Chan, 2008: 76; Tammen et al., 2000: 21-24)。Organski & Kugler (1980: 31-34) 從經濟生產力、勞動人口數以及國家汲取資源的能力衡量國家權力。經濟生產力關注國內技術發展、教育體制和資本密度；勞動人口數衡量能提供生產勞力的人數；國家汲取資源的能力則關注政府為了達成特定目標，從社會中擷取資源的能力，能力愈強成長速度愈快，愈能達到持續經濟成長的目標。兩位學者認為，若取勞動人口數和經濟生產力的交集，可將權力的測量列為公式(1)：

$$\begin{aligned} \text{權力 (power)} &= \text{人口數 (population)} \times \frac{\text{國民生產毛額 (GNP)}}{\text{人口數 (population)}} \\ &= \text{國民生產毛額 (GNP)} \end{aligned} \quad (1)$$

國民生產毛額 (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 就是一種內生成長因素的討論。內生成長因素假定封閉的經濟體系，意即不存在貿易對國家經濟成長的影響。這個假定雖有學術上簡單推論的好處，卻不符合現代經濟成長理論與過往歷史。從海權時代起，貿易已被視為驅動國家經濟成長的重要手段。葡萄牙、

西班牙、荷蘭、英國與美國等主導國都是以貿易增進財富後主導國際政治。更遑論中國一直都是貿易導向的經濟成長模式，壓低人民幣幣值以出口刺激國內生產並賺取國外資本。因此，論及經濟成長與國家權力時，必須將國際貿易納入，才不失偏頗。

事實上，權力轉移理論曾將貿易帶入模型討論，但貿易並非國家經濟成長的途徑，而是國家對現狀評斷後的考量。當主導國與挑戰國都滿於現狀，雙方採合作策略，貿易限制較少，衝突的可能也較低。相反的，若挑戰國不滿於現狀，非合作策略的可能性較高，貿易也會受到限制 (Tammen et al., 2000: 113-116)。這種關於貿易的觀點值得進一步討論。首先，這樣的觀點認為貿易政策反映出國家對安全和現狀維持的態度，愈滿意現狀的國家自由貿易愈可能推動。然而，現狀滿意度與貿易關係的因果關係不易建立，到底是對現狀滿意的國家會選擇自由貿易，還是國家因貿易利得而滿意現狀。其次，Tammen et al. (2000: 107) 認為，主導國必定滿意現狀，挑戰國則不一定，因此只有挑戰國會採對抗策略。這個觀點在歷史實例裡並不必然成立。1980年代，經濟實力快速累積的日本並無意改變現狀，採取對抗策略的是時居主導國的美國。相同的，近期的美中貿易戰也是如此。換言之，需要進一步界定貿易在權力轉移理論中的角色，並討論貿易對國家互動造成的影響。

## 二、貿易和平理論與中國崛起

貿易和平來自於自由主義和平理論的一環，基本概念是貿易國間衝突升級為軍事化衝突的可能性不高 (Doyle, 2005)。目前的文獻歸納了三種解釋 (Mansfield & Pollins, 2003: 2-3)。首先，貿易和衝突都是國家取得資源的手段，當貿易的成本愈低，取得資源的成本就愈低，國家以衝突獲取資源的可能性就愈低 (Copeland, 2015; Rosecrance, 1986)。其次，貿易促進國家間溝通與承諾。在良好溝通與可信承諾下，政治合作的可能性顯著提升，軍事化衝突自然減少 (Doyle, 1997)。最後，國內行為者扮演關鍵角色。在貿易關係中，國內生產者和消費者都會得利，因此這些國內行為者在經濟利得的驅動下對政府施壓，要求避免與貿易國發生衝突。政治人物為了獲得國內政治支持，選擇順應國內行為者的政治要求不與貿易國衝突，貿易因而降低了衝突持續升高的可能。

然而，貿易和平理論並未完全獲得實證上的支持。文獻發現，對等的貿易關係是貿易和平理論的前提，當處於不對稱貿易關係時，現實主義強調的相對得利 (relative gain) 或馬克思主義 (Marxism) 提出的貿易導致國家搶奪資源的衝突，都會增加貿易引發軍事化衝突的機率 (Barbieri, 2002: 31-37)。

支持或反對貿易和平論都有理論與實證的支持，到底哪一方較能詮釋貿易與衝突的關係，條件式關係的提出解決了這個困境。條件式關係的邏輯是，某些條件成立時貿易能降低軍事衝突的機率；反之，若條件未成立，衝突反而升高。若以條件式關係觀察「中國崛起」後的美中關係不難發現，貿易應能降低美中可能的緊張關係。

首先，貿易的重要性是貿易降低衝突的必要條件。這些重要性包括貿易占國家經濟的比例、雙方貿易的需求彈性以及是否具可替代性 (Gartzke & Westerwinter, 2016; Kleinberg & Fordham, 2010; Peterson, 2011; Peterson & Thies, 2012)。當有損貿易的因素出現時，貿易的重要性使得政府不得不調整行為以維護貿易利益。經濟數據顯示美中貿易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影響甚鉅。1990年代，美中貿易占中國國內生產毛額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達5.11%，這個比例逐年提升直至2006年，2006年後雖然比例逐漸降低，但都在5.03%以上。美中貿易對美國GDP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重要性。1990年代美中貿易占美國GDP的比例並不高，雖然逐年增加，但在2000年初期也才達平均1.66%。2008年後，美中貿易的占比開始大幅提升，2010~2016年更超過3.19%。同時雙方貿易商品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中國從美國進口大量大豆、棉花等，數量之大並非其他農業生產國所能提供，貿易替代性低。美國則從中國進口機工具與民生必需品，還包括被中國壟斷供給市場的電子產品所需原料稀土，這些貿易重要性使得美中兩國都不能輕忽美中貿易的變化。

其次，貿易有助於穩定國內政權時，貿易國之間的衝突便會降低。Gelpi & Grieco (2003: 46-50) 的研究指出，民主國家需採行吸引大眾支持的政策以維護政權，經濟成長便是其中最常見的選項。類似的觀點也適用於中國，Shirk (2007) 認為中國政府必須保持一定的經濟成長以維持政權穩定，建立統治正當性。換言之，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美中貿易牽動兩國經濟成長，在經濟成長助於穩定國內政權的前提下，美中兩國都有避免軍事衝突，繼續維持貿易往來的動機。

最後，貿易能降低衝突必須建立在沒有領土爭議的前提，因為領土威脅將會掩蓋經濟機會成本考量，貿易降低衝突的效果也會隨之降低 (Levy, 2003: 134-139)。美國和中國彼此領土互不接壤，沒有國土爭議，也沒有生存威脅。經濟機會成本的考量顯著，美中貿易互動應能降低彼此衝突升高的機率。

貿易和平理論雖能說明貿易的外溢效果，但最大的問題是忽略了貿易在安全與權力兩個議題的政治面向。Gowa (1994) 從安全外部性 (security externality)

提出貿易與政治的關聯性：國家可藉貿易賺取的財富增加軍事設備，將國內經濟資源轉移成軍事權力，產生貿易的安全外部性。安全外部性使得國家傾向與聯盟夥伴貿易，減少甚或拒絕和敵國貿易。

從經濟方策 (economic statecraft) 的角度，貿易本身就是國家影響他國的手段，就是國家權力的來源 (Baldwin, 1985)。國家得利用貿易正面獎勵（提供最惠國待遇、對方所需物資或降低關稅）或負面懲罰的方式（禁運、提高關稅或拒絕購買），改變對手國行為，完成既定目的，不需訴諸軍事武力。Hirschman (1980) 的研究闡述了貿易作為權力來源的兩種方式。第一個是貿易的供給效果 (supply effect)，貿易提供國家軍事設備所需的經濟資源。不過貿易供給效果僅是權力的間接來源，因為不發動軍事威脅，供給效果本身並無法遂行國家目的，軍事武力才是權力的直接來源。第二個是貿易影響效果 (influence effect)，這個效果才是貿易能直接提升國家權力的關鍵。貿易影響效果基於貿易的依賴關係 (dependence relationship)。在貿易依賴關係下，國家從三個方面取得權力。首先，大國可形塑小國的貿易條件 (the terms of trade) 影響其貿易所得 (gain from trade)。依賴大國的小國從大國市場賺取貿易利得，大國可威脅中斷貿易，減少小國貿易所得或增加小國調整市場的成本。其次，小國的既得利益者 (vested interests) 是大國影響小國的國內政治管道。既得利益者透過國內政治聯盟塑造小國國家利益，使得小國對國家利益的認知與大國一致。最後，大國在貿易依賴關係下成為小國產品的主要購買者，小國產品不易尋找替代市場，不易將小國貿易對象多元化，小國只能持續依賴大國，加深大國對小國的影響。

Hirschman 的研究使得經濟因素也可單獨成為國家權力來源，軍事權力並非國家權力唯一來源 (Abdelal & Kirshner, 1999)。但這是否意味著互賴的貿易關係下權力關係不存在，Keohane & Nye (1989) 的研究解決了這個爭議，說明了貿易互賴與國家權力的關係。兩位學者認為，貿易互賴關係中敏感度 (sensitivity) 和脆弱度 (vulnerability) 可用來測量互賴關係中的權力關係。敏感度是國家在環境改變時所付出的成本。脆弱度則是面臨不同替代性選項時，國家必須支付的調整成本。與敏感度相比，脆弱度和國家權力的關聯較大，因為國家若能快速調整因應外在變化，即使敏感度再高也只是短期現象；換言之，脆弱度較低的國家在貿易互賴關係中較具優勢，也較具權力。

從上述的討論可知，貿易和平理論對於貿易的探究過於單調，忽略貿易的政治面向。本文提出貿易—權力轉移的分析架構，期望能同時從權力結構與貿易關係，重新檢視美國與中國的互動關係。

## 參、貿易—權力轉移分析架構

權力轉移理論與貿易和平理論已然證實，國家對外關係的決策分別受到國際權力結構與國內貿易兩個因素影響。然而，國際權力結構和貿易關係這兩個因素並非獨立影響，在兩者相互作用之下，主導國和挑戰國將會作出異於原本理論預期的回應。以下分成三部分說明貿易—權力轉移架構。首先闡述權力差距、貿易與威脅之間的關係；其次，討論權力差距與貿易關係的交互作用；最後，提出本文對變數的測量方式。

### 一、權力差距、貿易與威脅

貿易刺激國家經濟成長，挑戰國在推動貿易的過程中，除了需要技術、勞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之外，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市場，<sup>1</sup>主導國正是挑戰國主要的市場提供者。對於主導國而言，提供市場的作為在不同的權力差距下具有不同意義。當差距大時，優勢權力的遮蔽使得主導國沒有安全顧慮，貿易被主導國視為控制挑戰國的手段，挑戰國基於經濟誘因，拒絕與主導國貿易的可能性不高。美國對二次戰後的日本與德國開放市場便是這一類的戰略思考，美國利用貿易深植日後對日德的影響力 (Maier, 1977)。

當差距小時，貿易增加他國將經濟資源轉換成軍事資源的可能性，貿易的安全外部性將被突顯。由於主導國不確定挑戰國的意圖，在國家安全與利益可能受到威脅之下，主導國會限制與挑戰國的貿易往來，雙邊貿易互動會逐漸停滯。貿易對主導國而言不但是國家帶動經濟成長的手段，也是國家的戰略手段，權力差距決定了這兩種效果的轉換。

權力差距的變動之所以會影響主導國的行為，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安全威脅不見得是他國兵臨城下，直接以軍事武力威脅，權力差距縮小本身就威脅到國家安全。主導國應拉開與他國的權力差距，繼續維持權力地位，如此才能保障主導國國家安全 (Mearsheimer, 2001)。除此之外，主導國制定國際規則的優勢也將因權力差距拉近而逐漸喪失 (Keohane & Nye, 1989)，當主導國無法再主導國際規則，國家利益將遭受損失。主導國因為安全外部性考量而片面限制甚至停止與挑戰國貿易時，中止的貿易將打擊挑戰國經濟，挑戰國可能會鋌而走險選

---

<sup>1</sup> 事實上，主導國除了可以提供挑戰國市場之外，也可以提供技術與資金。但本文因以貿易互賴與否為主要考量，所以不討論技術與資金的供給效果。

擇衝突以彌補損失，軍事衝突機率因而升高。不過最後的損失關乎雙邊貿易關係，因此必須將貿易關係帶入討論。

## 二、權力差距與貿易關係的交互作用以及衝突升高的可能

本文將兩國貿易關係分為兩種：一種是不對稱的貿易依賴關係；另一種則是對稱的貿易互賴關係。貿易—權力轉移架構的觀點即是將這兩種貿易關係和權力差距交互作用，建構出 $2 \times 2$ 的分析架構（如表一）。

首先討論主導國與挑戰國權力差距大的狀況。在這種狀況下，主導國沒有安全顧慮，貿易是主導國的權力資源，挑戰國則可從貿易關係中獲取貿易所得，因此雙方都沒有動機發動軍事衝突，總的來說，不同的貿易關係影響不大。從細節分析，狀況一描述雙方權力差距大且貿易呈依賴關係的情形。在這種狀況下，無論貿易依賴國是誰，主導國的權力優勢都存在，衝突升高的機率都不高。1860年代美國與英國的互動即為最佳例證。美國在南北戰爭後，貿易活動開始急速擴張，工業化後貿易成長更是驚人。1820年代美國出口英國僅5,200萬美元，1860年代即增加至2億3,000多萬美元，成長約4倍 (Hughes & Cain, 1993: 362)。農業是當時美國最重要的產業，就業人口約占整體一半 (Broadberry, 1998: 385)，美國的農產品也是英國最主要的進口產品，占英國進口小麥與麵粉的 $1/2 \sim 2/3$ 。緊密的經貿關係在當時的英國引起不少爭議，其中一個爭議便是這樣的經貿關係會影響英國對美洲軍事武力的使用 (Rothstein, 1960: 407)。實際的數據亦支持這樣的推論。根據戰爭相關計畫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COW) 的

表一 權力結構和貿易關係對衝突的影響

貿易關係	權力結構	
	權力差距大（貿易是權力資源）	權力差距小（貿易具安全外部性）
貿易依賴	狀況一：衝突升高機率低 發動者：無  例子：1860年代的英美  貿易主導國：強調貿易減少衝突 貿易依賴國：強調貿易減少衝突	狀況二：衝突升高機率高 發動者：貿易主導國 衝突上升的關鍵：貿易關係對依賴國的重要 例子：1980年代的日本  貿易主導國：發動衝突 貿易依賴國：視貿易的重要性決定回應方式
貿易互賴	狀況三：衝突升高機率甚低 發動者：無  主導國：強調貿易減少衝突 挑戰國：強調貿易減少衝突	狀況四：衝突升高機率中等 發動者：主導國 衝突上升的關鍵：挑戰國對國家權力的考量 例子：1895年的英美  主導國：發動衝突 挑戰國：考量衝突對國家權力的影響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資料，美國與英國在南北戰爭前總計有7次衝突，1812~1815年甚至發生第二次獨立戰爭，英軍攻進華盛頓特區，燒毀白宮。南北戰爭後，英美貿易頻繁，對峙情勢不再，1865~1895年僅發生1次零星衝突，兩國整體的緊張情勢大幅下降 (Correlates of War, 2020a: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狀況三則是雙方權力差距大且貿易呈互賴關係的情形。在這種情形下，主導國與挑戰國的關係應是最平和的，權力差距保障了主導國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再加上貿易互賴關係，雙方都沒有衝突升高的動機，衝突升高的機率理論上應為最低。

當權力差距拉近，主導國與挑戰國便產生一定程度的緊張，主導國傾向從安全外部性的角度思考雙邊貿易，同時，不同的貿易關係亦會影響到國家選擇回應緊張關係的手段。狀況二是在權力差距縮小下，雙方處於貿易依賴關係的情形。此時，貿易主導權決定衝突成本，在貿易上較具優勢的一方發動衝突的成本較低。假若主導國主導貿易關係，較低的衝突成本以及較具優勢的權力資源使得主導國在衝突中獲勝的機率較高，主導國便有「預防」挑戰國崛起的可能，因而提高了預防性戰爭的機率。當貿易主導權落在挑戰國手中，主導國片面降低貿易量造成挑戰國損失時，挑戰國具有動機升高衝突以求弭平損失，全面性戰爭的機率便會提高。換言之，在權力差距縮小與貿易依賴關係的交叉作用下，貿易主導國有動機發動衝突。

1980年代美國與日本的互動關係即屬於狀況二。二次戰後，為了防堵共產主義外擴，美國同意日本的产品可以自由進入美國，並允許日本採貿易保護政策。這個決定提升日本國力同時擴大美日貿易逆差。1965年，日本GDP只有美國的12.20%，到了1978年，這個差距已拉近至43.11%；1980年日本更超越蘇聯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經濟挑戰者。1971年美國首次出現貿易赤字，1984年更快速增加至1,080億美元，其中約有三分之一的貿易赤字來自日本。不僅是貿易赤字，日本的高技術產業亦威脅了美國相關產品，包括鋼鐵、汽車、石化和半導體，再加上日本貿易提高了日幣在國際金融市場的流通，美元的主導地位逐漸受到威脅。對此，美國開始使用超級301條款 (Super 301) 懲罰日本，限制日本對美貿易。對日本而言，美國是最重要的出口市場，1980年日本超過33.15%的出口銷往美國，1985年更高達47.01%，這使得日本不得不重視與美國的貿易關係 (Urata, 2020: 145)，再加上美國對日本在軍事安全上的保證，因此當美國對日本祭出解決貿易爭端的手段，日本全盤接受，包括超級301條款、日本出口自我設限的要求、1985年《廣場協議》 (Plaza Accord) 要求

日圓升值，以及1986年《美日半導體協議》(US-Japan Semiconductor Agreement) 要求日本開放半導體市場讓外國公司進入等作為 (Mastanduno, 1991)。在日本全盤接受美國的要求之下，雙方衝突不可能無限上綱，僅在衝突初期就已止息。<sup>2</sup>

狀況四則為權力差距拉近之下，雙方處於貿易互賴的情形。在這種情況下，貿易安全外部性的考量使得貿易互賴關係不一定能防止衝突的升高，國家的脆弱度決定了誰具有較多的權力，脆弱度愈低的國家在互賴關係中受損程度愈低，較有權力挑戰對手。假若主導國脆弱度較低，權力差距帶來的安全威脅以及貿易受損相對較小的優勢，給予主導國動機發動衝突。但若挑戰國的脆弱度較低，挑戰國則沒有動機發動衝突，一來挑戰國沒有權力差距拉近帶來的安全威脅，二來主導國中斷貿易雖也會帶來經濟損失，但因脆弱度較低之故，挑戰國的損失反而較主導國小，因此在貿易互賴的情況下，只有主導國的脆弱度較低時才有可能產生衝突。然而挑戰國在面對主導國的威脅時，雙邊緊密的貿易關係可能使挑戰國立即遭受巨大的經濟損失，經濟損失可能阻礙挑戰國在未來繼續累積國家權力。基於這層考量，挑戰國在面對主導國的威脅時，衝突升高的態勢可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壓制。

1895年委內瑞拉的邊境問題引發英美衝突的事件正是狀況四的歷史證明（徐棄郁，2014：66-103）。英國雖為當時的主導國，但美國國力因貿易推展已大幅拉近與英國的距離。1890年英國的人均GDP是4,009美元，美國則已達3,392美元 (van Zanden et al., 2014)，工業發展更是超越英國，雙方權力差距已然拉近。1895年的委內瑞拉事件是委內瑞拉與英屬圭亞那的邊境爭議，介於委內瑞拉以及英屬圭亞那的區域歸屬不明，由於該區發現金礦，英國強行將該區劃入英屬圭亞那，爆發了英國與美國的衝突。美國強調門羅主義，認為歐洲國家對美洲事務的干預損害美國利益，因此希望英國不要涉入委內瑞拉事件。英國回應，門羅主義不是國際原則，英國沒有遵守必要並認為美洲事務和美國利益無關，兩國緊張情勢急遽升高，戰爭一觸即發。當情勢升高至戰爭邊緣時，美國商業人士開始擔心衝突的經濟後果，反對與英國交惡。隨後，英國投資者開始大量拋售美元債券，美國黃金開始外流，這些作為使得美國總統克利夫蘭 (Stephen G. Cleveland) 不得不選擇和英國談判，避免損失擴大。

---

<sup>2</sup> 本文藉美日的案例說明在狀況二下挑戰國和主導國之間的互動狀況，不過必須承認日本在面對美國的威脅時，美日因有軍事安全上的保護與依賴關係，僅能在經濟層面回應，無法全然如權力轉移論所述，發動軍事衝突解決彼此衝突。這是本文在這部分的研究限制，感謝評審委員的指證。

### 三、變數的測量方式

#### (一) 衝突升高的測量

國家間的衝突不可避免，關鍵是國家如何回應衝突。當衝突發生時，國家有許多回應衝突的方式。COW按照回應的敵意程度，將國家回應衝突的方式分為五個等級，第一等級：未採用任何軍事行動；第二等級：威脅使用武力，包括威脅採封鎖手段、威脅占領領土、威脅宣戰、威脅使用生化武器和威脅參戰；第三等級：展示武力，包括提出武力警告、提出核武警告、軍事動員、邊境駐防、騷擾邊境；第四等級：使用武力，包括封鎖、占領領土、掠取充公、武力攻擊、激烈衝突、宣戰、使用生化武器；第五等級：戰爭階段，包括備戰、正式開戰。本文按照COW的區分方式，當國家回應方式的等級愈高，即代表雙方衝突情勢上升。

COW資料庫同時也記載了1816~2014年各國發生衝突的概況以及國家回應方式的敵意程度，因此可以從兩個面向測量衝突局勢是否升高。一個是國家回應衝突方式的敵意程度，另一個則是衝突的次數。簡言之，當敵意程度或衝突次數增加時，衝突的局勢便往上攀升。本文從COW資料庫中擷取美中互動的狀況，並從上述貿易—權力轉移的分析架構分析美中關係的發展。

#### (二) 權力差距的測量

目前權力差距的測量主要依據權力轉移理論的觀點以GDP衡量，當挑戰國的GDP達主導國的80%，雙方的權力差距即為接近。<sup>3</sup>但本文採用中美兩國GDP的購買力平價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 來衡量，依然是以挑戰國的PPP是否達主導國的80%為標準。相較於GDP，PPP被認為更適合用以說明國家權力的差距。Allison (2017: 28-39) 提到「PPP不僅能評估相對的經濟實力，特別要評估軍事潛力時，作為一個近似值，最好的標準是PPP。這可以衡量一個國家可以購買多少飛機、飛彈、船隻、水手、飛行員、無人駕駛飛機，基地和其他那些一個國家可以用本國貨幣支付其價格的與軍事有關的物品」。相較於GDP，PPP考量貨幣的購買力，購買力愈強勢的貨幣，愈能增添所需的後勤補給以及軍事設施，更能表示國家權力差距的改變。

<sup>3</sup> 傳統文獻是以 GNP 為衡量依據，但陳重成、唐欣偉（2005）發現，以 GDP 和 GNP 的測量差異不大，因此也可用 GDP 取代 GNP

### (三) 貿易關係的測量

貿易關係是國際政治與安全領域中的關鍵變數，但卻缺乏明確的方式測量貿易關係。目前文獻多從貿易數量測量，例如Zhang & Hock (1996) 便以中國與東南亞國協之間的出口量，測量兩者間的貿易關係。Gartzke & Li (2003) 則引用貿易依賴度 (trade dependence)，也就是兩國貿易占該國GDP之比，討論貿易依賴與衝突之間的關聯。不過，Mansfield & Pollins (2001) 認為，貿易關係不應以絕對貿易量為測量標準，應考慮貿易中斷時兩國付出的成本比，貿易流量大並不代表國家必須付出巨大的調整成本。當對手國中斷貿易，若兩國調整貿易行為的成本比差異不大，即可推定雙方處於互賴關係；當某國需付出較高的調整成本，雙方即處於貿易依賴關係。儘管變動成本比的概念較貿易數量更能描繪貿易關係，不過仍缺乏客觀標準說明兩國成本比的差距到底該多大貿易關係才呈現依賴關係。

為解決測量貿易關係的問題，本文提出新的測量方式。本文認為「貿易依賴」應定義為貿易依靠程度落差的結果。若說A國依賴B國，應該意指A國貿易依靠B國貿易的程度大於B國貿易依靠A國貿易的程度。相同的邏輯，「貿易互賴」應定義為貿易依靠程度對等的結果，也就是A國貿易依靠B國貿易的程度等同於B國貿易依靠A國貿易的程度。因此，本文以兩階段測量貿易關係。第一階段測量兩國的依靠程度，第二階段則比較兩國貿易依靠程度是否相當。

貿易依靠程度如同表二所示，同時以他國貿易占本國貿易比例和變動成本比來測量。貿易依靠程度分為四個類別，分別是貿易依靠程度I（本國變動成本高，他國貿易占比高）、貿易依靠程度II（本國變動成本高，他國貿易占比低）、貿易依靠程度III（本國變動成本低，他國貿易占比高），以及貿易依靠程度IV（本國變動成本低，他國貿易占比低）。依據Mansfield & Pollins (2001) 的研究，變動成本比應為考量兩國貿易依靠程度的首要因素，因此在這四個類別中依靠程度最高的是程度I，之後依序為II、III、IV。

表二 兩國的貿易依靠程度

變動成本	他國貿易占比	
	占比高	占比低
本國變動成本高	貿易依靠程度I	貿易依靠程度II
本國變動成本低	貿易依靠程度III	貿易依靠程度IV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本文借用Laakso & Taagepera (1979) 有效政黨數 (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測量他國貿易占本國貿易的比例。有效政黨數以各政黨在國會中的席次率計算具有政治實力的政黨數目。本文利用這個概念，以貿易夥伴國的貿易量占本國貿易的比例計算具有貿易影響力的貿易夥伴國數目，也就是有效貿易國數 (effective number of trading countries, ENTC) 的概念。

有效貿易國數的公式(2) 如下：

$$ENTC = \frac{1}{\sum t_i^2} \quad (t_i: \text{貿易夥伴國}i\text{占本國貿易的比例}) \quad (2)$$

有效貿易國數解決了缺乏客觀標準判斷的問題。計算出有效貿易國數，再與貿易夥伴國貿易量的排名做比對，就可以瞭解該貿易夥伴國的貿易量是否為高，只要貿易夥伴國的排名在有效貿易國數之內，就可客觀地認定貿易夥伴國的占比偏高。

變動成本的概念是貿易中斷時的調整成本。這個成本比主要觀察兩國主要的出口商品，測量方式是比較該國出口量占該商品在全球出口與進口市場的比例。測量的邏輯是，A國出口至B國，貿易中斷時，兩國必須考量的是，A國將該商品轉出口至其他進口國的可能性，以及B國從其他出口國獲得該項商品的可能性。前者關乎該商品在全球的進口市場，後者則是該商品在全球的出口市場。對A國來說，當A國出口B國的商品占全球出口市場的比例愈大，占進口市場的比例愈小時，A國的變動成本愈小。因此，將A國出口B國的商品占全球進口市場之比除以占全球出口市場之比，所得的商數若小於1，A國的變動成本較B國小；反之，若商數大於1，A國的變動成本則較B國為大。例如，A國出口至B國的商品占全球該商品進口市場的10%與出口市場的20%，A國對B國的變動成本比就是1/2，也就是A國的變動成本是B國的1/2倍。

測量完貿易依靠程度後，再來比對兩國依靠程度是否相當。當兩國貿易依靠程度都落在同樣的類別，兩國貿易依靠程度即為相當。以表二來說，兩國貿易關係都為[I, I]、[II, II]、[III, III]以及[IV, IV]時，即為貿易關係相當的「貿易互賴」。當然「貿易互賴」依然有內部的差異，當兩國的貿易關係都為I時，貿易互賴關係程度也最高，其次分別為[II, II]、[III, III]以及[IV, IV]。

另外一種狀況則是兩國不對等的貿易關係。當兩國貿易依靠程度差異愈大時，貿易依賴的關係愈顯著。所以，貿易依賴關係最小的應屬於雙方貿易依靠

程度稍有落差的類別 ([I, II] [II, I] [II, III] [III, II] [III, IV] [IV, III])，其次則是貿易依靠程度落差較大者 ([I, III] [III, I] [II, IV] [IV, II])，最後兩國貿易依靠程度落差最大者 ([I, IV] [IV, I])，貿易依賴關係也最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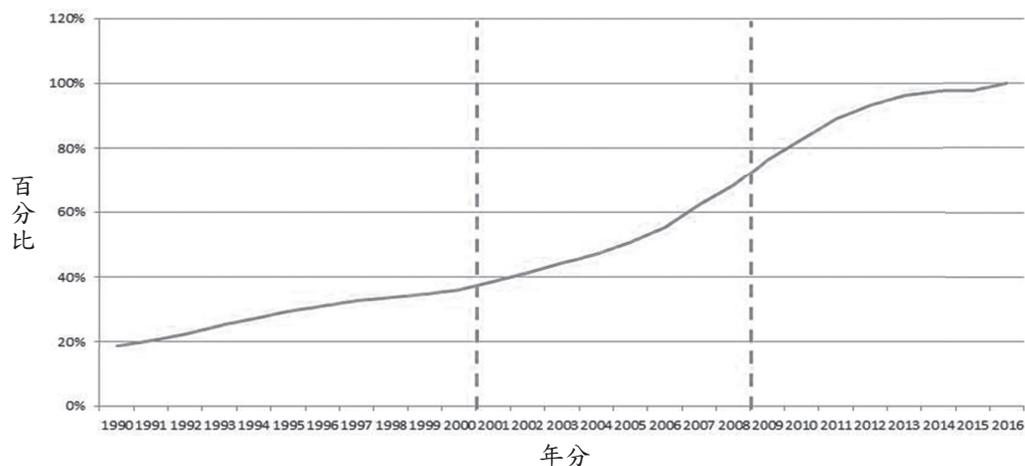
## 肆、美中互動關係解析：貿易—權力轉移的分析架構

本文將美中關係的發展依照權力差距分為三個階段：1990～2000年時期的老布希 (George H. W. Bush) 與柯林頓 (William J. Clinton)，2001～2008年的小布希 (George W. Bush)，以及2009～2016年的歐巴馬。以下先說明劃分三個時期的依據，再說明這三個時期對華政策的差異，最後觀察1990～2016年美中雙方衝突情勢，<sup>4</sup>用以證實貿易—權力轉移架構的適用性。

### 一、美國對華政策的三個時期

本文以中國與美國的PPP之比來衡量兩國權力差距的變化，當中國的PPP達美國的80%，雙方的權力差距即為接近。圖一顯示美中兩國在1990～2016年PPP的比例。該圖將美中的權力差距分為三個不同時期，剛好反映了美國不同時期的總統。

第一個時期是1990～2000年，跨越美國總統老布希和柯林頓。這個時期美中權力差距顯著，中國PPP持續緩慢成長，平均而言，此時中國PPP僅達美國的



圖一 中國與美國GDP購買力平價之比

資料來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n.d.: *The World Bank*)。

<sup>4</sup> 因為 COW 只記載 1816～2014 年間國家的衝突與戰爭狀況，其餘年分的資料則從 CNN 的網頁擷取。

28.00%。第二個時期則是2001~2008年，美國總統則是小布希。這個時期美中權力差距快速拉近，2001年中國PPP為美國的38.60%，到了2008年這個比例已至68.20%。同時，這個時期也是拉近美中PPP速率最快的時間，從圖一可知增加速率線筆直上升。最後一個時期則是2009~2016年，美國總統是歐巴馬。這個時期美中權力差距已經拉近。美國受金融風暴之累經濟呈負成長，中國經濟雖也受到衝擊，成長幅度趨緩，但仍是正成長。在此消彼長之下，2010年中國的PPP已達美國的82.57%，符合權力轉移理論認定80%的標準。

接下來觀察美中兩國在這三個時期的貿易發展。表三和表四分別記錄這三個時期，中國與美國出口的有效貿易國數以及對手國的排名。美國在1997年之前雖為中國前幾大出口市場，但都未能列入有效貿易國之列，要至1998年之後才進入名單。因此，時至後兩個時期（2001~2008年以及2009~2016年）美國

表三 中國出口的有效貿易國數與美國占中國出口的排名

年分	有效貿易國數	美國排名	年分	有效貿易國數	美國排名	年分	有效貿易國數	美國排名
1992	1.37	3	2001	2.36	1	2010	3.22	1
1993	2.09	2	2002	2.39	1	2011	3.25	1
1994	1.92	3	2003	2.50	1	2012	3.14	1
1995	1.96	3	2004	2.59	1	2013	3.04	1
1996	1.98	3	2005	2.68	1	2014	3.19	1
1997	2.02	2	2006	2.81	1	2015	3.22	1
1998	2.28	1	2007	2.99	1	2016	3.24	1
1999	2.29	1	2008	3.17	1			
2000	2.33	1	2009	3.15	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n.d.: *The World Bank*)。

表四 美國出口的有效貿易國數與中國占美國出口的排名

年分	有效貿易國數	中國排名	年分	有效貿易國數	中國排名	年分	有效貿易國數	中國排名
1992	3.68	14	2001	3.30	9	2010	3.60	3
1993	3.61	12	2002	3.28	7	2011	3.61	3
1994	3.52	13	2003	3.27	6	2012	3.59	3
1995	3.52	12	2004	3.33	5	2013	3.57	3
1996	3.52	14	2005	3.35	4	2014	3.54	3
1997	3.53	13	2006	3.45	4	2015	3.52	3
1998	3.51	12	2007	3.57	3	2016	3.51	3
1999	3.28	11	2008	3.66	3			
2000	3.27	10	2009	3.65	3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n.d.: *The World Bank*)。

才屬於他國占比高的類別，第一個時期（1990～2000年）美國屬於占比低的類別。表四顯示，2007年之後中國才進入美國的有效貿易國名單之內，因此前兩期（1990～2000年以及2001～2008年），中國屬於他國占比低的類別，最後一期（2009～2016年），中國才屬占比高的類別。

附錄一和附錄二分別記錄了中國與美國出口至對方前五大產品、該產品占出口至對手國的比例、該產品占全球進出口該產品的市場比例以及變動成本比。這些數據顯示，雖然僅是諸多貿易商品中的前五大主要商品，但都占出口對手國六、七成以上的高比例，用以描繪美中兩國的貿易關係具一定代表性。依據中國與美國出口產品所占的全球進口與出口市場之比，本文在附錄一和附錄二中亦計算出變動成本比，由於變動成本比在一個時期內有時會高於1有時會小於1，為避免受到極端值影響，當難以判斷該時期的變動成本是否為高時，則以該時期變動成本的中位數為準。

從附錄一可知，1990年代中國對美國的變動成本比都小於1，代表這段時間中國的變動成本較美國為小，因此將中國在1992～2000年間的出口狀況列為本國變動成本低的類別。2001～2008年與2009～2016年間，中國對美國的變動成本比都大於1，換言之，這兩個時期中國屬於本國變動成本高的類別。

在附錄二中，美國對中國的變動成本比在1990年代以及2001～2008年間都明顯大於1，屬於本國變動成本高的類別。但在2009～2016年間，美國對中國的變動成本比變異度較大，有四個時期成本比小於1，有四個時期成本比大於1。為能精確判斷並不受極端值影響，以該時期的中位數1.04為準，美國在這段時間屬於本國變動成本高的類別。

表五將中國與美國的貿易發展按照四種不同的貿易依靠關係予以分類，並列於下方。從相對關係可知，1992～2000年間，儘管中國出口占美國出口的比例很低，但因美中兩國市場開放程度差別之故，中國與美國處於貿易依賴關係（IV對II，美國依賴中國）；2001～2008年間，中國與美國依然處於貿易依賴關係（I對II，中國依賴美國），依賴關係改為中國依賴美國；2009～2016年間，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進入另一個階段，雙方處於貿易互賴關係（I對I）。

依上所述，表六以貿易一權力轉移的分析架構將1992～2016年間的美中關係依序分類。1992～2000年間，雙方權力差距大且美國貿易依賴中國，屬於狀況一。依據分析架構的推測，美國應願意擴大與中國貿易，利用貿易關係影響中國發展。2001～2008年雙方差距逐漸拉小，但美國仍具有優勢，中國貿易依賴美國市場，整體情勢演變至狀況二。最後2009～2016年，雙方權力差距變小而且貿易呈現互賴關係，即為狀況四。

表五 中國與美國的貿易發展

變動成本	他國貿易占比		
	占比高	占比低	
本國變動成本高	貿易依靠程度I 中國2001~2008年出口 中國2009~2016年出口 美國2009~2016年出口	貿易依靠程度II 美國1992~2008年出口 美國2001~2008年出口	
本國變動成本低	貿易依靠程度III	貿易依靠程度IV 中國1992~2000年出口	
中國貿易依靠程度	年分	美國貿易依靠程度	貿易關係
貿易依靠程度IV	1992~2000	貿易依靠程度II	美國依賴中國(II vs. IV)
貿易依靠程度I	2001~2008	貿易依靠程度II	中國依賴美國(I vs. II)
貿易依靠程度I	2009~2016	貿易依靠程度I	美中互賴(I vs. I)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表六 1992~2016年的美中關係

貿易關係	權力結構	
	權力差距大 (貿易本質：貿易是權力資源)	權力差距小 (貿易本質：貿易具安全外部性)
雙方貿易依賴	1992~2000年／美國依賴中國	2001~2008年／中國依賴美國
雙方貿易互賴		2009~2016年／美中貿易互賴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 二、貿易—權力轉移的分析架構與美中關係發展

根據貿易—權力轉移分析架構的觀點，1992~2000年間權力差距使得美國強調貿易是權力資源，彼此衝突性不高；2001~2008年間貿易的本質有所不同，相較於1992~2000年彼此衝突性應當較高；2009~2016年權力差距則使得美國重視貿易的安全外部性，但美中貿易互賴關係應使得中國對美國的態度較為保守。以下先從COW資料檢視這三個時期美中衝突情勢，再分述這三個時期美中關係概況與特殊案例。

根據COW資料庫，1992~2000年間，在這近廿年間美國與中國只發生三次衝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屬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大使館事件。大使館的不可侵犯權一直都是國際法所保障的原則，因此大使館被美國轟炸不僅少見，更具高度政治敏感，儘管如此，中國並未提高衝突層級，僅以展示武力的方式回應。2001~2008年間，美國與中國的直接衝突也只有三次，其中雙方衝突與回應的敵意程度最高者即為美中撞機事件，美中雙方都以第四等級（即使用武力）的方式回應，離最高的第五等級更為接近。2009~2016年間，美國與中國

兩國衝突的次數增加為十一次，不過雙方武力對峙的態勢減少，不若前一階段衝突性較高。

表七整理歷年美中兩國發生的衝突以及兩國採取的行動。從表七可知，1992～2000年以及2001～2008年美中兩國發生衝突的次數相同，但後一時期的時間長度明顯短於前一時期，衝突密度明顯提升，而且在這一時期國家回應衝突的強度也增加，中國在回應南海撞機事件時已達敵意程度四。2009～2016年間，衝突次數明顯增加，不過兩國回應的衝突性明顯降低，美國多次採取非軍事性的行動，中國也僅止於展示武力，雙方都未採取行動進一步提升衝突。上述美中衝突的態勢符合貿易—權力轉移分析架構的預期，以下從該分析架構分析美中關係的變化。

### (一) 中國與美國權力差距大且美中貿易呈現依賴關係的年代 (1990～2000年)

#### 1. 美中關係的演進

1990～2000年間，美國獨享霸權，美中實力差距甚大，此時美國對華政策目的是藉著美國的貿易優勢將中國融入國際市場。一來美國可牽制中國，二來經濟自由化後的中國可能走向政治民主化，自由民主的中國符合美國國家利益（張亞中、孫國祥，1999：80-85；Lampton, 2003: 19-20; Papayoanou & Kastner, 1999）。

老布希與柯林頓的對華政策即建立在此基礎之上。1989年1月老布希總統宣誓就職後，隨即展開一連串訪華行程，陸續和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總書記趙紫陽、國家主席楊尚昆、總理李鵬和外交部長錢其琛進行會談。會談中，老布希總統強調，美中兩國需要在全球經濟增長、解決全球環保問題和制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方面進行合作。此時美國的對華政策僅是延續尼克森「聯中制蘇」的全球戰略考量。

1989年6月的天安門事件衝擊了美國「聯中制蘇」的對華政策，美國國會與社會大眾都認為，基於人權立場美國應制裁中國。老布希政府受到國內政治壓力對中國採取經濟制裁，美國和中國的經濟互動戛然而止，「聯中」受到美國國內政治抵制。緊接著1991年12月蘇聯解體，使得美國「制蘇」的全球戰略不具正當性，「聯中制蘇」是否需繼續維持產生疑慮。

不過這些衝擊並未影響老布希政府對華政策的立場。老布希總統曾表示：「處理美中關係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中國正在悄悄步蘇聯的後塵，如果我們單方面地排斥它們並將它們與西方國家隔離開來，它們肯定會更強硬地倒退

表七 1990~2016年的美中關係

美國行動	衝突事件的時間	中國行動
1992~2000年		
未採軍事行動(敵意程度一)	1994年8月 中國在朝鮮半島軍演	展示武力 (敵意程度三)
展示武力(敵意程度三)	1995年7月 臺海危機	邊境駐防 (敵意程度三)
展示武力(敵意程度三)	1999年2月 臺海危機	騷擾邊境 (敵意程度三)
2001~2008年		
騷擾邊境(敵意程度三)	2001年4月 美中撞機事件	掠取充公 (敵意程度四)
騷擾邊境(敵意程度三)	2001年3月 臺海危機	展示武力 (敵意程度三)
未採軍事行動(敵意程度一)	2002年9月 中國巡邏艦在黃海驅離美國水文調查船	展示武力 (敵意程度三)
2009~2016年		
展示武力(敵意程度三)	2009年3月 美軍偵察艦無暇號南海事件	展示武力 (敵意程度三)
未採軍事行動(敵意程度一)	2011年6月 中國軍機與美國偵察艦在臺灣海峽衝突	展示武力 (敵意程度三)
未採軍事行動(敵意程度一)	2013年11月 美國、南韓與日本派航空母艦通過東海區域	展示武力 (敵意程度三)
展示武力(敵意程度三)	2013年12月 中國軍艦在南海逼退美國巡洋艦	展示武力 (敵意程度三)
未採軍事行動(敵意程度一)	2014年5月 中美涉入俄羅斯在日本與南韓海域活動	未採軍事行動 (敵意程度一)
未採軍事行動(敵意程度一)	2014年8月 美國偵察機在南海遭遇中國軍機攔截	展示武力 (敵意程度三)
未採軍事行動(敵意程度一)	2015年5月 美國近岸戰鬥艦駛近南沙群島與中國軍艦 以商定密碼溝通	未採軍事行動 (敵意程度一)
未採軍事行動(敵意程度一)	2015年10月 美國驅逐艦巡航南海中國派護衛艦跟監	展示武力 (敵意程度三)
未採軍事行動(敵意程度一)	2015年11月 美國派遣兩架戰略轟炸機進入南沙群島	未採軍事行動 (敵意程度一)
未採軍事行動(敵意程度一)	2016年1月 美國派遣驅逐艦進入南海中國布署地對空 飛彈	展示武力 (敵意程度三)
未採軍事行動(敵意程度一)	2016年5月 美國偵察機進入南海中國派遣戰機跟監	展示武力 (敵意程度三)

資料來源：1. 1990~2014年資料來自於COW資料庫 (Correlates of War, 2020b: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2. 2015~2016年資料來自於CNN (Crawford, 2016; Lee, 2016; Scitutto & Ellis, 2015; Scitutto & Starr, 2015)。

回去。」(Lampton, 2003: 14) 因此經濟制裁幾個月後，老布希總統兩次派遣國家安全顧問史考克羅夫 (Brent Scowcroft) 到中國密訪中國領導人，穩定美中關係，並逐漸撤銷經濟與軍事方面的制裁，恢復和中國經濟互動。國會對此極度不滿，認為老布希政府罔顧人權，提案建議取消美國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眾議員婁洛西 (Nancy Pelosi) 更提議將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議題掛勾，若中國未能落實人權保障，則於次年取消最惠國待遇。不過老布希政府否決這些提案，堅持繼續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

1992年老布希尋求連任與民主黨柯林頓競爭總統大位。競選期間柯林頓對老布希政府的對華政策大肆批評，認為老布希政府偏袒中國政權，罔顧中國人權，美國應強硬地對待中國。選舉結果，老布希尋求連任失利，柯林頓贏得1992年總統大選並在1996年連任。不過，八年任期內，柯林頓卻採取了與競選期間大相逕庭的對華政策。1992年獲勝後，柯林頓立即宣布：「不去孤立中國，期待中國繼續向市場經濟發展，這攸關我們的重大利益。」(Mann, 1998: 21-22) 1994年，柯林頓政府直接宣布中國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議題脫鉤；1997年柯林頓和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聯合發表聲明，預計在21世紀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雖然最後這份聲明的口號性質多於實質內容，但也代表兩國嘗試深化彼此關係，從經濟領域交流提升至安全領域。

中國政府亦以與美國建立良好政治與經濟關係為前提。1993年首屆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在西雅圖召開，美國總統柯林頓與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會面，雙方都強調中國與美國雖然存在分歧但仍具共同利益，對於分歧雙方能透過對話與協商解決。1995年江澤民即表示，中國對美政策必須秉持「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等原則。90年代末期，美中兩國開始出現貿易逆差，美國提出制裁名單要求中國改善，中國本企圖提出報復名單，針對美國部分商品課徵100%關稅，但最後考量到中國對美國市場的需求，最終以簽屬協議的方式結束90年代末期的衝突（張登及、王似華，2010：63）。

從上述可知，雙方都無意將衝突升高，其中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是個很好的案例，可藉觀察中國與美國對該事件的反應，瞭解雙方態度。

## 2. 美國轟炸中國大使館

1999年塞爾維亞總統米洛塞維奇 (Slobodan Milošević) 對科索沃境內的阿爾巴尼亞人進行種族清洗，美國和北約組織高度注意，隨時準備制止不人道的屠

殺行為。中國反對美國與西歐國家干預，認為這屬南斯拉夫內政，外國勢力不應介入。該年5月，美國B-2隱形轟炸機對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投擲三枚導彈飛彈，3名中國駐外人員死亡，20多人炸傷。美國的說法是中國大使館被誤標為塞爾維亞的軍事目標，所以只是一個誤炸的意外。中國則不相信美國說詞，認為誤標只是推託之詞。中國民間和媒體開始大肆批評美國的暴力行為，中國政府隨即中斷和美國在軍事、外交與經濟的互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也隨之暫停。

中斷的時間並沒有持續很久，美中雙方很快就達成協議，美國同意賠償2,800萬美元的財產損失，對死傷人員賠償450萬美元並解雇當時參與目標定位的中央情報局人員。賠償協議之後，美中隨即在9月恢復雙邊貿易關係與後續的世界貿易組織談判，11月即達成協議，美國同意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李肇星，2014：55-71）。

這樣的互動相當符合貿易—權力轉移分析架構的預期，即使發生轟炸大使館此等大事，美中雙方亦都無動機將衝突升高，僅四個月就恢復兩國之間正常的交往。

## （二）中國與美國權力差距開始拉近且中國開始依靠美國的年代（2001～2008年）

### 1. 美中關係的演進

2001年美國實力正值頂峰，政治上蘇聯瓦解，軍事預算上美國超過日本、德國、英國和法國總和，總額超過4,200多億美元，世界排名第一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20: *SIPRI*)。儘管如此，面對中國崛起，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萊斯 (Condoleezza Rice) 依然指出，中國並非滿於現狀的強權，而是亟欲改變亞洲權力平衡，使之朝向有利於自身的強權，因此中國不是柯林頓政府所認為的「戰略夥伴」而是「戰略競爭者」。這樣的觀點陸續出現在小布希政府官員的對外談話。小布希總統曾說：第一，中國是美國競爭者，不是戰略夥伴；第二，中國正投資大量資金發展戰略核子武器、導彈系統、遠洋海軍和長程空軍。美國國務卿鮑爾 (Colin L. Powell) 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中亦曾強調，中國非美國的戰略夥伴，而是美國的競爭者及有潛力的區域強權（吳安家，2002）。

不僅在軍事安全上的競爭，美中貿易亦爭議不斷。美國貿易赤字急速增加，2004年已達1,600億美元。美國指控中國政府刻意貶值貨幣對美國進行不公

平的貿易競爭，要求中國政府將匯率市場化，讓人民幣升值2.10%。面對這些指控，中國政府強調人民幣價值的合理性，認為美國錯誤指控中國，兩國關係在這個階段顯然不如前一階段穩定 (Friedberg, 2005)。

這種競爭局面並沒有維持很久。2001年9月911事件爆發，美國將注意力從中國轉移至恐怖主義。注意力的轉移帶來兩個對華政策的重大改變：第一，小布希總統對於中國不再提「戰略競爭者」，而改稱「建設性合作關係」。第二，由於打擊恐怖主義需世界各國合作，包括中國，美國因而對「中國威脅論」的說詞稍微低調，中國因而能順勢以「和平崛起，永不稱霸」合理化中國軍力大幅提升的事實。同時，胡錦濤與江澤民在2003年訪美時，對中東問題採取溫和立場，支持西方國家聯軍攻打伊拉克（張登及、王似華，2010：71-72）；另外中國雖稱匯率政策一切合理，但屈就於美國貨幣權力的威脅，中國選擇讓步（趙文志，2011）。2005年人民幣升值2.1%，並允許人民幣匯率在3%的區間浮動。簡言之，美中關係在2001～2008年間衝突開始提升，後因突發的911事件與中國讓步的情況下，衝突的發展又趨於平緩。

## 2. 美中撞機事件

2001年，一架隸屬美國海軍的電子偵察機在中國的南海專屬經濟區執行軍事任務時和中國軍機碰撞，軍機墜毀，飛行員因公殉職，美國偵察機迫降海南島的陵水軍用機場，機上24名機組人員隨即被中國政府逮捕。該事件顯然是美國闖入中國領地執行軍事任務，中國對此表示抗議，兩國情勢隨即升高緊張關係。不過，中國很快就轉圜調整，事件發生後的隔日中國政府便宣布遣送24名機組人員返美並同意歸還美國迫降海南島之電子偵察機，美國事後僅支付24名機組人員在中國期間的花費，並未做出任何賠償，整起事件迅速落幕 (Ellison, 2001: *The Guardian*)。

### (三) 中國與美國權力差距逐漸拉近且美中互賴的年代 (2009～2016年)

#### 1. 美中關係演進

2008年後美中關係相形複雜。2007～2008年的金融風暴重創美國經濟，重新恢復經濟秩序成為歐巴馬政府首要工作。中國雖也受到金融風暴影響，但仍能維持9.55%以上的經濟成長率，縮短美中兩國的權力差距。中國國防預算亦隨之大幅提升，2016年中國國防預算已是世界第二，約美國的三分之一。在中國國防政策不透明，美國無法完全掌握中國未來軍事動向之下，美國國家安全與美國在亞洲的利益都產生隱憂。另一方面，2008年後的國際局勢，美國更需中國在國際經濟與國際安全方面的合作，美國對華政策在這種牽一髮動全身的局面下變得異常複雜。

歐巴馬就任後隨即面臨這種挑戰，先尋求中國的合作，強調不會師法小布希政府戰略競爭者的政策，採取與中國「合作、正向與全面」的互動關係 (Zhao, 2012: 372)，隨即參訪中國，延後達賴喇嘛訪美與美國軍售臺灣的時間。不過，歐巴馬政府也不放心「中國崛起」後的局勢，重新調整美國在亞洲的部署，提出「亞洲再平衡」戰略，再次連結起美國和中國周遭國家間的關係（張登及，2013）。

美中貿易使得美國的對華政策更具挑戰性。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商品多屬民生消費品，數量龐大。根據世界貿易整合資料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WITS)，機電產品和衣料紡織產品是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大宗，光這兩項產品就占美國進口商品的55.00%以上 (China Mach and Elec Exports by Country in US\$ Thousand 2016, n.d.: *The World Bank*; China Textiles and Clothing Exports by Country in US\$ Thousand 2019, n.d.: *The World Bank*)。貿易數量龐大，美國不易找到替代中國的進口市場，同時因為價格相對低廉，任何的變動將導致美國國內消費商品價格上漲。換言之，在兩國貿易關係與歐巴馬政府亟欲振興美國國內經濟的限制下，即使美中兩國權力差距拉近，美國倍感威脅，此時的美國選擇不輕易挑起衝突。

歐巴馬政府的南海政策正可看出美中雙方的態度。美國一方面想穩固亞洲，但另一方面又不想挑起衝突。中國則是保守以對，避免升高衝突局面。

## 2. 歐巴馬政府的南海議題

2010年歐巴馬政府確立了「亞洲再平衡」戰略；同年，國務卿希拉蕊 (Hillary Clinton) 在東協區域論壇發表演說，表達美國對南海議題的關切，認為中國在南海的作為影響到航行自由，並提出中國在南海的主張應以實際控制的島礁為準。這兩個重要的事件透露了歐巴馬政府對南海議題態度的轉變（林正義，2016）。在歐巴馬總統前的美國政府對於南海議題較為被動，一來南海非其領土而且以往美國多關注中東；二來美國長年來對南海議題的態度多與航行自由權有關，對於南海主權的爭議多採不干涉的立場。然而，2009年中國外交部抨擊美軍偵察艦「無暇號」(USS Impeccable) 在南海中國專屬經濟海域內未經中國許可從事特殊活動，之後陸續干擾美國在相關海域的活動，再加上中國崛起，拉近美中之間的權力差距，這使得美國將注意力轉移至中國，進而對南海議題的關注亦大幅提升。

2013年菲律賓總統艾奎諾三世 (Benigno Aquino III) 認為中國針對南海區域所提出的「九段線」主張違反《聯合國海洋公約》，因此向國際法庭提出國際仲裁。美國政府不僅支持菲律賓的訴訟，更提供法律攻防援助。美國的反應

引起中國的抗議，認為美國涉入無關美國的南海主權爭議。同年，美軍巡洋艦「考本斯號」(USS Cowpens) 在南海區域巡弋，中國政府認為該艦在南海進行軍事監視因而派遣軍艦伺嚇，雙方距離不到200碼，逼迫該艦駛出南海區域。2014年，美軍P8A偵察機「海神」(Poseidon) 從菲律賓出發，到南海區域巡邏，中國認為其侵入所屬海域派遣殲11戰機近距離攔截。2015年，歐巴馬政府關切中國在南海區域建立人工島礁與軍事設備，多次派遣戰機、戰艦與偵察機接近中國所興建的人工島礁，呼籲中國應停止興建人工島礁，軍事化南海議題。儘管美國看似處處與中國對立，但從實際政策的執行可看出美國對華政策的複雜性。一方面美國無論在國際或區域議題上都必須對中國崛起有所回應，以免讓中國或其他國家錯誤解讀美國的態度；另一方面美國重視經貿利益，因此仍必須和中國維持正面的關係（李大中，2017：50）。

中國認為南海爭議應由當事國協商與談判，不應訴諸國際化與軍事化（孫國祥，2016：32）。另外也認知中國與美國在軍事能力上的差距，不可能與美國正面衝突，因此，即使會驅趕美軍在南海區域的軍事活動，但中國也主動減少巡航頻率。2015年習近平訪美，在白宮向歐巴馬總統承諾不會將南海群島軍事化，希望中美兩國能在合作共贏的精神下推動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胡敏遠，2018）。

## 伍、結論

本文旨在結合權力轉移理論和貿易和平理論，以貿易—權力轉移的架構分析主導國與挑戰國關係的發展，所嘗試的不但是提出一個一般性的分析架構，更企圖分析1990～2016年美中關係的發展。2000年之前，經濟成長快速的中國尚未拉近與美國的權力差距，尚未對美國造成威脅，此時的美國企圖以貿易作為影響中國的手段，希望藉貿易改變中國政治發展，「中國崛起」並未造成美中兩國對峙的情勢，此時的「中國崛起」即為表一中的狀況一。2000年之後，美國從「中國崛起」中看到1980年代日本的影子，貿易不再是美國獲取權力的手段，反倒是擴大中國權力具安全外部性的負面因素。美國開始加大對中國政府操弄匯率的控訴，開始省思中國威脅的可能，美中局勢的發展走向表一中的狀況二。不過，在國際情勢轉向注意恐怖主義以及中國選擇退讓調整相關政策之下，對峙情勢有所控制。隨著兩國權力差距持續縮小以及貿易關係持續深化，美中關係已然進入另外一個階段。2009～2016年的美中關係，深具政治與經濟實力的中國已然是世界舞臺的要角，美國在面對中國時得更加深思熟慮。一方面權力差距的拉近增加美中之間的競爭性，另一方面，盤根錯節的貿易使

得美國對中國強硬的手段動輒得咎。同時，由於美國是目前中國最大的進出口市場，中國短期內不易調整貿易結構，因此，即便美國對中國採對抗性較高的政策，中國回應的態度都會相對保守，兩國軍事衝突的可能因而不高，目前局勢的發展即為表一中的狀況四。

不過整體發展有兩個值得觀察的重點。一個是美國的態度。美國川普(Donald Trump)總統在2017年就任後隨即落實競選期間的承諾，當逐漸擺脫國內經濟衰退的桎梏以及北韓問題的牽制後，美國川普總統隨即向中國叫戰，以關稅限制中國的技術與貿易，回應美國國家安全與利益受到中國的威脅。在未來美國是否會持續並加大對中國貿易的限制，是未來經貿衝突是否會升高至軍事衝突的重要關鍵。更重要的是中國的自覺。目前中國一方面設法減緩美國高關稅的衝擊，另一方面開始調整與美國貿易的關係，加大內需占GDP的比例。一旦美中兩國貿易的牽絆舒緩，美國若持續叫陣，目前局面是否仍舊維持，中國是否仍會退讓不無異議。

身處第一島鏈的臺灣是美中衝突不可或缺的战略要地。棘手的是，中國與美國又是目前臺灣前兩大出口市場，無論喪失哪一邊的市場，對於臺灣經濟的衝擊都將無法估量。因此，如何正確評估美中關係，不單從國際結構而是同時考量國際與國內因素，對臺灣制定經濟和安全政策而言格外重要。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部分

- 李大中，2017，〈美國歐巴馬政府時期的南海政策〉，《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8卷第3期，頁41-84。
- 李肇星，2014，《說不盡的外交》，香港：三聯。
- 吳玉山，2011，〈權力轉移理論：悲劇預言？〉，載於包宗和（編著），《國際關係理論》，頁389-415，臺北：五南。
- 吳安家，2002，〈論小布希政府的對華政策〉，《遠景基金會季刊》，第3卷第3期，頁137-159。doi:10.7063/PQ.200207.0137
- 林正義，2016，〈歐巴馬政府的南海政策：中國的回應及對臺灣的影響〉，《東吳政治學報》，第34卷第1期，頁1-80。
- 胡敏遠，2018，〈中美南海議題之競合——中國追求「新型大國關係」的挑戰〉，《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9卷第1期，頁57-107。
- 徐棄郁，2014，《帝國定型：美國的1890-1900》，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孫國祥，2016，〈中國南海作為之政策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53期，頁29-34。
- 張亞中、孫國祥，1999，《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臺北：生智。
- 張登及，2013，〈「再平衡」對美中關係之影響：一個理論與政策的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4卷第2期，頁53-98。
- 張登及、王似華，2010，〈中美建交三十年：北京對美政策與雙邊關係回顧〉，《全球政治評論》，第32期，頁49-76。doi:10.29899/JRM.201010.0006
- 陳重成、唐欣偉，2005，〈中國大陸崛起對當前國際體系的衝擊〉，《遠景基金會季刊》，第6卷第4期，頁101-137。doi:10.7063/PQ.200510.0101
- 陳亮智，2009，〈尋找解釋美中戰略競爭的驅動力量：安全困境，權力平衡，或是權力轉移？〉，《中國大陸研究》，第52卷第1期，頁87-124。doi:10.30389/MCS.200903\_52(1).0004
- 趙文志，2011，〈國際貨幣權力理論的應用：中國匯率政策改變的原因分析〉，《問題與研究》，第50卷第2期，頁143-162。doi:10.30390/ISC.201106\_50(2).0005

## 二、英文部分

- “China Mach and Elec Exports by Country in US\$ Thousand 2016,” n.d. in *The World Bank*: [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Country/CHN/Year/2016/TradeFlow/Export/Partner/by-country/Product/84-85\\_MachElec](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Country/CHN/Year/2016/TradeFlow/Export/Partner/by-country/Product/84-85_MachElec), Available: 2020/12/05.
- “China Textiles and Clothing Exports by Country in US\$ Thousand 2019,” n.d. in *The World Bank*: [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Country/CHN/Year/LTST/TradeFlow/Export/Partner/by-country/Product/50-63\\_TextCloth](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Country/CHN/Year/LTST/TradeFlow/Export/Partner/by-country/Product/50-63_TextCloth), Available: 2020/12/05.
-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n.d. in *The World Bank*: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Available: 2019/01/02.
-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n.d. in *The World Bank*: <https://wits.worldbank.org/Default.aspx?lang=en>, Available: 2019/01/02.
- Abdelal, R., & Kirshner, J., 1999. “Strategy,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he Defini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Security Studies*, Vol. 9, No. 1-2, pp. 119-156. doi:10.1080/09636419908429397
- Allison, G. T., 2017.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 Baldwin, D. A., 1985. *Economic Statecraf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rbieri, K., 2002. *The Liberal Illusion: Does Trade Promote Peace?*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Broadberry, S. N., 1998. “How did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Overtake Britain? A Sectoral Analysis of Comparative Productivity Levels, 1870-199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8, No. 2, pp. 375-407. doi:10.1017/S0022050700020556
- Chan, S., 2004. “Exploring Puzzles in Power-Transition Theory: Implications f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ecurity Studies*, Vol. 13, No. 3, pp. 103-141. doi:10.1080/09636410490914077
- Chan, S., 2008. *China, the U.S., and the Power-Transition Theory: A Critique*. New York: Routledge.
- Copeland, D. C., 2000.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opeland, D. C., 2015.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 University Press.
-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2020a. "Data on Incidents within MIDs from 1993-2014, V5.0." in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https://correlatesofwar.org/data-sets/MIDs>, Available: 2020/12/12.
-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2020b. "MID-Level and Incident-Level Data 5.0." in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https://correlatesofwar.org/data-sets/MIDs/mid-5-data-and-supporting-materials.zip/view>, Available: 2020/12/12.
- Crawford, J., 2016, "Pentagon: 'Unsafe' Intercept over South China Sea." in *CNN*: <https://edition.cnn.com/2016/05/18/politics/pentagon-south-china-sea-intercept/index.html>, Available: 2020/12/05.
- Doyle, M. W., 1997. *Ways of War and Peace: Realism,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New York: Norton.
- Doyle, M. W., 2005. "Three Pillars of the Liberal Pea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9, No. 3, pp. 463-466. doi:10.1017/S0003055405051798
- Ellison, M., 2001. "China Eases Spy Plane Surveillance." in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1/jul/30/china.usa>, Available: 2019/6/28.
- Friedberg, A. L., 2005.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pp. 7-45. doi:10.1162/016228805775124589
- Gartzke, E., & Li, Q., 2003. "Measure for Measure: Concept Operationalization and the Trade Interdependence-Conflict Debat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0, No. 5, pp. 553-571. doi:10.1177/00223433030405004
- Gartzke, E., & Westerwinter, O., 2016. "The Complex Structure of Commercial Peace Contrasting Trade Interdependence, Asymmetry, and Multipolarit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3, No. 3, pp. 325-343. doi:10.1177/0022343316637895
- Geller, D. S., 1992. "Capability Concentration, Power Transition, and War."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17, No. 3, pp. 269-284. doi:10.1080/03050629208434783
- Gelpi, C. F., & Grieco, J. M., 2003.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he Democratic State, and the Liberal Peace." In E. D. Mansfield & B. M. Pollins, ed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Perspectives on an Enduring Debate* (pp. 44-59).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Gowa, J., 1994. *Allies, Adversar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irschman, A. O., 1980.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Berke-

- 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ughes, J., & Cain, L. P., 1993.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
- Keohane, R. O., & Nye, J. S., 1989.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Boston, MA: Longman.
- Kim, W., 2015. "Rising China, Pivotal Middle Power South Korea, and Alliance Transi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Review*, Vol. 18, No. 3, pp. 251-265. doi:10.1177/2233865915595531
- Kim, W., & Morrow, J. D., 1992. "When Do Power Shifts Lead to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6, No. 4, pp. 896-922. doi:10.2307/2111353
- Kleinberg, K. B., & Fordham, B. O., 2010. "Trade and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4, No. 5, pp. 687-714. doi:10.1177/0022002710364128
- Laakso, M., & Taagepera, R., 1979. "'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A Measure with Application to West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12, No.1, pp. 3-27. doi:10.1177/001041407901200101
- Lampton, D. M., 2003.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bow, R. N., & Valentino, B., 2009. "Lost in Transi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3, No. 3, pp. 389-410. doi:10.1177/0047117809340481
- Lee, B., 2016. "China Deploys Missiles on South China Sea Island." in *The News Lens*: <https://international.thenewslens.com/article/36480>, Available: 2020/12/05.
- Levy, J. S., 2003.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Opportunity Costs, and Peace." In E. D. Mansfield & B. M. Pollins, ed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Perspectives on an Enduring Debate* (pp. 127-147).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Lim, Y.-H., 2015. "How (Dis)Satisfied is China? A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4, No. 92, pp. 280-297. doi:10.1080/10670564.2014.932160
- Maier, C. S., 1977.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vity: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after World War II."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1, No.4, pp. 607-633. doi:10.1017/S0020818300018634
- Mann, J. H., 1998.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Mansfield, E. D., 1994. *Power, Trade, and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nsfield, E. D., & Pollins, B. M., 2001. "The Study of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Recent Advances, Open Ques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5, No. 6, pp. 834-859. doi:10.1177/0022002701045006007
- Mansfield, E. D., & Pollins, B. M., 2003.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An Introduction." In E. D. Mansfield & B. M. Pollins, ed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Perspectives on an Enduring Debate* (pp.1-28).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Mastanduno, M., 1991. "Do Relative Gains Matter? America's Response to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6, No.1, pp. 73-113. doi:10.2307/2539052
- Mearsheimer, J.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 Organski, A. F. K., 1968.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 Organski, A. F. K., & Kugler, J., 1980. *The War Ledger*.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apayoanou, P. A., & Kastner, S. L., 1999. "Sleeping with the (Potential) Enemy: Assessing the U.S. Policy of Engagement with China." *Security Studies*, Vol. 9, No. 1-2, pp. 157-187. doi:10.1080/09636419908429398
- Peterson, T. M., 2011. "Third-Party Trade, Political Similarity, and Dyadic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8, No. 2, pp. 185-200. doi:10.1177/0022343310396266
- Peterson, T. M., & Thies, C. G., 2012. "Beyond Ricardo: The Link between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Peac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2, No. 4, pp. 747-767. doi:10.1017/S0007123412000129
- Rosecrance, R., 1986.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 Rothstein, M., 1960. "America in the International Rivalry for the British Wheat Market, 1860-1914."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Vol. 47, No. 3, pp. 401-418. doi:10.2307/1888874
- Sciutto, J., & Ellis, R., 2015. "China Complains about U.S. Plane Straying into Disputed Airspace." in *CNN*: <https://edition.cnn.com/2015/12/18/asia/u-s-south-china-sea-airspace/index.html>, Available: 2020/12/05.

- Sciutto, J., & Starr, B., 2015. "U.S. Warship Sails Close to Chinese Artificial Island in South China Sea." in *CNN*: <https://edition.cnn.com/2015/10/26/politics/south-china-sea-islands-u-s-destroyer/index.html>, Available: 2020/12/05.
- Shirk, S. L., 2007.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20.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in *SIPRI*: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Available: 2020/12/12.
- Tammen, R. L., & Kugler, J., 2006. "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 No. 1, pp. 35-55. doi:10.1093/cjip/pol003
- Tammen, R. L., et al., 2000.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n House Publishers.
- Urata, S., 2020. "US–Japan Trade Frictions: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S–China Trade War."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Vol. 15, No. 1, pp. 141-159. doi:10.1111/aepr.12279
- van Zanden, J., et al., eds., 2014. *How Was Life? Global Well-being since 1820*. Paris: OECD Publishing. doi:10.1787/9789264214262-en
- Weinhardt, C., & ten Brink, T., 2020. "Varieties of Contestation: China's Rise and the Liberal Trade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7, No. 2, pp. 258-280. doi:10.1080/09692290.2019.1699145
- Zhang, Z., & Hock, O. C., 1996. "Trade Interdependence and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between ASEAN and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Vol. 24, No. 1, pp. 155-170. doi:10.1016/0305-750X(95)00120-2
- Zhao, S., 2012. "Shaping the Regional Context of China's Rise: How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rought Back Hedge in its Engagement with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1, No. 75, pp. 369-389. doi:10.1080/10670564.2011.647428

### 附錄一 中國出口美國的主要商品與變動成本比 (1992 ~ 2016年)

中國出口美國 前五大出口商品	年分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紡織品		紡織品	機工具									
鞋類	鞋類	鞋類	雜項									
雜項	機工具	機工具	鞋類									
機工具	雜物	雜物	紡織品									
燃料	皮革	皮革	皮革	皮革	金屬品							
占中國出口美國比	77.40%	77.40%	76.50%	73.68%	75.35%	76.71%	77.30%	77.68%	76.94%	76.94%	76.94%	76.94%
占全球進口比例	7.48%	14.23%	13.43%	12.49%	9.85%	11.60%	12.94%	13.17%	14.24%	14.24%	14.24%	14.24%
占全球出口比例	9.45%	16.42%	14.07%	13.08%	10.47%	12.33%	13.88%	14.51%	13.82%	13.82%	13.82%	13.82%
變動成本比 (中位數 : 0.94)	0.79	0.87	0.95	0.96	0.94	0.94	0.93	0.91	1.03	1.03	1.03	1.03

中國出口美國 前五大出口商品	年分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機工具	機工具	機工具	機工具	機工具	機工具	機工具	機工具	機工具	機工具	機工具	機工具	機工具
雜項	雜項	雜項	雜項	雜項	雜項	雜項	雜項	雜項	雜項	雜項	雜項	雜項
鞋類	鞋類	鞋類	鞋類	鞋類	鞋類	鞋類	鞋類	鞋類	鞋類	鞋類	鞋類	鞋類
紡織品	紡織品	紡織品	紡織品	紡織品	紡織品	紡織品	紡織品	紡織品	紡織品	紡織品	紡織品	紡織品
金屬品	金屬品	金屬品	金屬品	金屬品	金屬品	金屬品	金屬品	金屬品	金屬品	金屬品	金屬品	金屬品
占中國出口美國比	77.04%	77.92%	78.52%	79.35%	80.39%	81.00%	81.41%	80.47%	80.47%	80.47%	80.47%	80.47%
占全球進口比例	14.63%	15.43%	15.81%	16.84%	19.55%	20.72%	20.87%	20.97%	20.97%	20.97%	20.97%	20.97%
占全球出口比例	14.28%	15.08%	15.29%	16.07%	18.55%	19.65%	19.44%	19.30%	19.30%	19.30%	19.30%	19.30%
變動成本比 (中位數 : 1.05)	1.02	1.02	1.03	1.05	1.05	1.05	1.07	1.09	1.09	1.09	1.09	1.09

中國出口美國	年分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前五大出口商品	機工具 雜項 紡織品 金屬品 鞋類	機工具 雜項 紡織品 金屬品 鞋類	機工具 雜項 紡織品 金屬品 鞋類	機工具 雜項 紡織品 金屬品 鞋類	機工具 雜項 紡織品 金屬品 塑料橡膠	機工具 雜項 紡織品 金屬品 塑料橡膠	機工具 雜項 紡織品 金屬品 鞋類	機工具 雜項 紡織品 金屬品 鞋類	機工具 雜項 紡織品 金屬品 交通運輸	
占中國出口美國比	82.15%	81.00%	79.52%	79.51%	79.55%	79.51%	79.15%	79.88%		
占全球進口比例	22.81%	24.61%	24.22%	26.72%	16.49%	17.28%	30.30%	17.63%		
占全球出口比例	20.94%	22.63%	21.69%	23.26%	14.10%	14.90%	25.80%	15.24%		
變動成本比(中位數: 1.15)	1.09	1.09	1.12	1.15	1.17	1.16	1.17	1.16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n.d.: *The World Bank*)。

## 附錄二 美國出口中國的主要商品與變動成本比 (1992 ~ 2016年)

美國出口中國 前五大出口商品	年分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交通運輸	交通運輸	交通運輸	機工具									
機工具	機工具	機工具	交通運輸									
化工製品	化工製品	化工製品	化工製品	化工製品	化工製品	化工製品	化工製品	化工製品	化工製品	化工製品	化工製品	化工製品
雜項	雜項	雜項	紡織品	交通運輸	雜項							
金屬品	金屬品	金屬品	雜項	紡織品	紡織品	紡織品	雜項	木材	木材	木材	木材	金屬品
占美國出口中國比	79.03%	84.61%	84.14%	78.56%	74.59%	76.55%	81.18%	80.15%	80.15%	80.15%	80.15%	70.41%
占全球進口比例	2.14%	2.08%	1.76%	2.31%	1.81%	1.51%	1.91%	1.38%	1.38%	1.38%	1.38%	1.80%
占全球出口比例	1.73%	1.83%	1.60%	2.23%	1.76%	1.40%	1.82%	1.51%	1.51%	1.51%	1.51%	1.65%
變動成本比 (中位數: 1.07)	1.24	1.14	1.11	1.03	1.03	1.07	1.05	0.92	0.92	0.92	0.92	1.09

美國出口中國 前五大出口商品	年分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機工具	機工具	機工具	機工具	機工具	機工具	機工具	機工具	機工具
交通運輸	交通運輸	交通運輸	交通運輸	交通運輸	交通運輸	交通運輸	交通運輸	交通運輸
雜項	雜項	雜項	雜項	雜項	雜項	雜項	雜項	雜項
金屬品	金屬品	金屬品	金屬品	金屬品	金屬品	金屬品	金屬品	金屬品
蔬果類	蔬果類	蔬果類	雜項	雜項	雜項	雜項	雜項	雜項
占美國出口中國比	73.03%	72.42%	70.83%	67.69%	63.50%	71.04%	70.42%	70.58%
占全球進口比例	2.08%	1.77%	3.09%	2.76%	2.29%	2.55%	2.54%	3.64%
占全球出口比例	1.91%	1.51%	2.86%	2.56%	1.99%	2.17%	3.15%	3.37%
變動成本比 (中位數: 1.09)	1.09	1.18	1.08	1.08	1.15	1.18	0.81	1.08

美國出口中國	年分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前五大出口商品	機工具 雜項 蔬果類 金屬品 化工製品	機工具 雜項 蔬果類 金屬品 化工製品	機工具 雜項 蔬果類 金屬品 化工製品	機工具 蔬果類 雜項 金屬品 化工製品	機工具 雜項 蔬果類 交通運輸 化工製品	雜項 機工具 蔬果類 交通運輸 化工製品	雜項 機工具 蔬果類 交通運輸 化工製品	雜項 機工具 蔬果類 交通運輸 化工製品	交通運輸 機工具 蔬果類 雜項 化工製品		
占美國出口中國比	74.37%	70.88%	66.97%	67.90%	67.79%	71.11%	73.03%	74.33%			
占全球進口比例	3.80%	5.69%	5.11%	4.92%	6.13%	6.36%	4.61%	4.54%			
占全球出口比例	4.78%	5.13%	4.54%	5.06%	5.32%	5.54%	5.45%	5.72%			
變動成本比(中位數: 1.04)	0.79	1.11	1.12	0.97	1.15	1.15	0.85	0.7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n.d.: *The World Bank*)。